

崇文丛书

主编 徐 晔

我的文明观

彭树智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我的文明观

彭树智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文明观/彭树智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8
(崇文丛书)
ISBN 978-7-5604-3265-6

I. ①我… II. ①彭… III. ①文化史—世界—文集
IV. ①K1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7144 号

我的文明观

彭树智 著

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029-88302590 88303593)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6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586 千字

ISBN 978-7-5604-3265-6

定价: (精装) 165.00 元

(平装) 98.00 元

《崇文丛书》编委会

主 任：张祖培

副 主 任：秦向东 徐 晔 高松岩 王景安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牛致功	毛 铤	石兴邦	江文湛	刘文西
刘善继	任学启	李 杰	杨建辉	杨晓蔚
陈 青	陈全方	陈忠实	陈景富	张建文
张俊卿	何炼成	武复兴	苗重安	茹 桂
钟明善	郭全忠	梁亚莉	阎景翰	萧 焕
彭树智	路毓贤	蔡 恒	霍松林	戴希斌

主 编：徐 晔

本卷执行主编：彭 卫 杨振红

| 代序

世界历史：人类文明交往的新自觉时期^①

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性自觉是历史的自觉。这种自觉在人类历史发展总轨迹线上，所呈现的是逐步摆脱旧的精神枷锁和思想桎梏，不断摆脱野蛮性而日渐文明化的过程。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历史特点，是由情绪化走向理智化，是由自在走向自为，是由必然走向自由，是由对立、对抗、战争走向对话、合作、和平。总之，是由自发性走向自觉性的演进过程。

我在《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了《论人类文明交往》一文，其中谈到这个历史进程：“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但表现于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而且也使历史交往由地域的、民族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逐步转变为世界的历史。”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划时代转折。人类历史从此进入一个全世界性的、紧密联系的、文明交往的新的自觉时期。在上述文章中，我也谈到世界历史是全球化的文明交往时期：“所谓‘世界历史’是指人类在交往中不断跨越时空的自然障碍和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实现充分沟通和达到共知、达成共识的结果。文明交往的每一

^①本文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的“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交往”专栏。编者在前言中指出：“文明是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单位。特别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文明的多层次交往频繁，既有对话合作，也有差异分歧。由此角度，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文明交往的进程。”同时，编者也指出，有关文明交往的探讨，不仅有利于深化对文明本身及文明交往的认识，也有助于促进对世界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了解。此次发表时，作了修改。

进展，都包含着全球性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十六世纪加快了步伐，逐渐成为当今的全球化交往。”

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来源于历史科学，而历史科学是关于自然和人类交往进程的宏观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交往互动的规律审视历史，就可以发现：历史是人类在文明交往中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深厚的自然—社会结构，它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有漫长发展的自然史。人类出现之后，也有文明的前史和文明史。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始终按着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差异区别的逻辑，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暗隐，或线型或面型地交织在一起。循此思路，人类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人类的自然历史时期，或称人类文明前史。人类同自然（其他物种、自然环境、地球）相生相伴，如影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人类源于自然生物界中的动物界，后又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人猿揖别，实现了人与自然交往的一大转变。人类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是从赋予自然物质以人文因素开始的，表现了早期朦胧的交往自觉意识。第一件人工石器诞生之前，世界完全处于自然状态；第一件人工石器诞生之后，表明人类已开始以自己劳动之手、思维之脑创造石器工具，从而逐渐步入文明状态。真正进入文明时期，还必须在生产和精神劳动的漫长过程中，在自然和人的双重交往过程中完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人类的原始社会是渔猎经济，其交往为原始的血缘交往，它把文明交往的许多基因，如血缘、家庭、家族、部落、种族以及兽性，遗传给以后的时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人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之间的差异。”^②这种兽性与人性之间的差异，表明了野蛮与文明的分野，也说明了人类摆脱兽性欲望始终是文明自觉的不可忘记的目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0 页。

第二，人类的文明历史时期，或称人类的文明交往的自觉时期。人类摆脱蒙昧和野蛮的状态以后，便逐渐发展到具有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遗产的文明开化形态。随着文字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出现、国家和法律秩序的建立、经贸交往及市场的扩大、活动范围的扩展，人类的文明自觉随着历史自觉的提高而走向深化。在畜牧农耕的自然经济时期，交往的地缘关系上升为主导地位，地域空间的交往范围愈来愈扩大。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交往特别频繁。交往主体随着地缘的扩展而表现为种族、民族，乃至社会、宗教共同体，而等级制、宗法制、伦理道德体系成为文明交往的社会、政治和精神中枢。国家中央集权强化，帝国霸权力量日增，自我中心主义膨胀。亚述君主自称“王中之王”“宇宙之王”，自居天下之中的“中华帝国”强调“华夷之分”，波斯君主自称“世界之王”，而希腊、罗马帝国也视游牧世界为“野族世界”。此种霸权主义的遗留也传至以后的资本主义全球支配时代。

第三，人类的世界历史时期，或称人类文明交往的新的自觉时期。人类文明交往史转折于西欧的农本向工商业发展基础上实现的、以大机器工业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和以全世界为市场的外向型商品经济。资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决定了它向世界范围扩张，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跨国家、跨地区的生产方式和文明交往方式。由此，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就是由地缘的国家性交往发展为全球化交往和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文明交往的互动规律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就越成为世界史。”^①全球化是一本打开了人类本质力量的书，其中蕴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我身心的文明交往，特别是包含着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坚持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各种文明类型的国家，都面对着全球化的人类交往的新时期。十八、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欧美日本民族国家体系和二十世纪建立起来的亚非拉美民族国家体系，都在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和平、对话、合作问题上，考验自身文明的自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世界历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不仅是分期分段的体系问题，也是用学科理论来贯通历史与现状的关系问题。历史学科理论，即“史学之魂”。理论的滞后，从深层制约着史学的发展和对史学本体的认识。西方学者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专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世界史作跨学科分析，这无疑有助于开阔思路和推动学科体系创新。然而，现存的专门学科理论基本上是根据欧美各国的发展经验构筑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完全适用于非欧美社会，何况跨学科只是从综合研究着眼而容易离开史学本体。史学需要有本学科的理论。世界史学科更需要自身的具体理论，这是任何总体概论所不能代替的。二十世纪中，有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的文明理论。但历史学家对之持有疑义，是有道理的。研究者总不能总是翱翔于宏观的“高明之见”的天空上“悬而不下”，也不能总沉湎于微观的“考索之功”的底层而“不思上升”，更不能宥于政治偏见、陷于思维的片面性而“不能自拔”。我认为，历史上一切变动，无论是政治、民族、宗教，无论是经济、生产、社会、文化，都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明显或不明显表现。反映历史本体的文明交往理论，必须建立在众多典型历史个案的总体思考和对现状的全面理解与客观检验的厚实基础之上，才能得到逐步丰富和完善。

和一般文明理论不同，我在世界史，特别是中东史领域的探索中，把“文明”和“交往”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概念——“文明交往”；同时，又用“生命”“价值”和“动力”三要素表述文明交往的内在联系：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研究人类历史、现状和未来，不可不研究文化问题，而文化研究则必须上升到文明层次，用唯物史观把文化和文明统一起来，成为整体。另一方面，研究文明问题必须深入到文明交往问题。全人类都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之间的交往文明化问题，因为它既是人类对现实创造的积极肯定，又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我曾经提出：“不论人们之间如何矛盾冲突，人们总是要在同一地球上生存发展，各种不同文明总要接触对话。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期望着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架起彼此理解之桥。文明交往论正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有助于全球社会文明和谐问题的科学课题。”^①这是我在2001年《文

^①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明交往论》出版前言的结语。

《文明交往论》一书从以下方面表述理论要点：人类文明交往的基础是生产实践活动，而生产实践活动的前提是人类的社会交往，这种人同自然的双重交往关系，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人类文明交往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使人类历史由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从分散逐步转变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历史；人类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贯穿于四大文明交往的过程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客体—主体多向联系的本质统一；人类文明交往因社会历史状况错综复杂而表现为多种多样，大致而言，和平与暴力是两种基本的交往形式；人类文明交往的重要因素是主体和客观、交通和科技、民族和国家、利益和正义；人类文明交往的基本属性是实践性、互动性、开放性、多样性、迁徙性；人类文明交往的链条为七对环节，分别为挑战与应战、冲突与整合、有序与无序、外化与内化、现代与传统、全球与本土、人类与自然；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总特点是由自发走向自觉，由自在走向自为，由情绪化走向理智化，由必然走向自由，由对立、对抗走向对话、合作；人类文明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和谐、平等、互利，是对自己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异己文明的互尊、宽容乃至欣赏，是抱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广阔胸怀和对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追求。

我把文明交往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观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在编写世界史教材过程中，结合学习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时逐步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给我很大启迪。他们在这本著作中，从“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出发，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高度，阐明了唯物史观。

我正是由此出发，对世界历史、中东历史中的文明交往规律性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阿拉伯国家史》的修订过程中，我探讨了二十世纪阿拉伯世界与外部文明的交往方面涌现的人文社会科学清新潮流。对文明交往的新现象有如下思考：这是一股和阿拉伯世界内部相辉映的、有深厚文史哲根基，并吸取西方文明的侨民文化；它的代表人物是美籍巴勒斯坦裔文化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他在《东方学》著作中澄清了欧美式的“东方主义”迷

雾，以远见和客观视野评价了阿拉伯、伊斯兰和中东问题^①；它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是美籍黎巴嫩裔历史学家菲力普·K·希提和美籍黎巴嫩裔文学家纪伯伦。前者的名著《阿拉伯通史》和《叙利亚通史》反映了不同文明交往的深度，把史学的通识和通变建立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之上，堪称“侨民史学”的代表作；后者融东西方文学思想，并用阿拉伯语与英语写作诗文的“纪伯伦风格”而开创一代新风，其代表作《先知》被冰心赞誉为“满含东方气息的超妙哲理和流丽文词”，可与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的名作相媲美。萨义德关心伊斯兰文明的发展，然而他和印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一样，对自己本民族文明的前途不持乐观态度。伊斯兰文明的复兴力量，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民族内部的经济程度，自然这后面还有深远的历史道理和外部文明交往的因素。可以肯定地说，文明交往的自觉性，是任何一种古老文明复兴的最关键的精神力量。中国功夫（武术）中，有守望门派的“定力”之说。这是一个立足于本派内在特色的力量，以此为“定力”，吸收别派之长，进行综合创新。文明复兴的生命力，最根本关键在于内在生长的交往“定力”，和适应新生存环境变化而复兴与创造新文化的交往“定力”。总之，《阿拉伯国家史》的修订使我从文明交往的思考进入了文明交往自觉的思索；这种思考也与高教版的《二十世纪中东史》《世界史》和商务版的《中东国家通史》等书的编写过程结合在一起，这种历史和逻辑思维的发展，使我从中东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变动中深深感到，文明交往的真谛在于人类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性的自觉。这使我由文明交往论进入了文化自觉论的思考，在《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②中，我提出了“文明交往论是文明自觉论”的命题。这个命题经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和人民版的《中东史》而进入一个新的思考阶段。

我深深感到：人类文明的自觉，不仅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提升，而且文明自觉实质上就是文明交往的自觉，是人类交往的文明化。这种自觉，是人类用自

①在研究中东与外部交往问题中，萨义德的《东方学》启发了许多中国学者。如青年学者田瑾的新作《奥斯曼帝国与欧洲文化交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她在书中，也用了《文明交往论》的视角，观察西方文化和奥斯曼帝国文化之间的双方互动交流活动。

②彭树智：《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8页。

身的精神觉醒观察世界历史，是人类用自身的文明开启蒙昧和野蛮，是追寻人类文明交往中的盛衰与复兴，是人类在文明交往中不断摆脱新的枷锁而获得思想解放，是人类在实践中提高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升华。文明自觉，是以文化思想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文明自觉论可称之为文明交往自觉论，其要点可简略概括如下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又递进演进的九个方面：

一个中轴律：人类文明交往互动辩证规律。人类文明交往互动作用是人类社会变动的终极原因，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的辩证法则。交往互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对立与统一的多向的、一与多、同与异、常与变、主动与被动、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变的辩证形态，交往互动规律本身也就是一个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因此，每个文明同其他文明的交往互动，也必然包含着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由此便引起对抗、冲突和共处、同进。文明对抗、冲突和文明共处、同进，是文明交往互动中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的统一。那种把对立面的斗争理解为绝对的、完全把对立的两面分离开来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是片面的、孤立的和僵化的思维。相对中的绝对，有限中的无限，暂时中的长久，这是事物的常态。只有在整体系统思维中，观察各种要素和环节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动态多样性，才能察觉到综合、集合的互动交往力；互动是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彼此转化；斗争是手段，和谐是目的。认识和把握交往互动律的自觉性表现为：在深刻的矛盾对立中，把握文明交往互动，把对抗、冲突和共处、同进统一于历史选择的相融点上，使之在这个平衡状态的中轴律上自觉良性运转。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 1922 年访问中国时所讲：“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中华文明的内外交往，^①也是如此。中华文明之所以有持续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内在传承力和外在开放力的内外交往文明化的相互密切联系上。

两类经纬线：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经线为相同文明之内的相互融合；纬线

①史例之一，是穆斯林学者马明良较早的著作《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的历程和前景》。他在这一著作中，对这两大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进行了详细系统考察，见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罗素所讲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是很重要的纬线，是文明交往史上人们用力最多的研究领域。然而，在人类文明交往过程中，不可忽视相同文明之内的相互融合的经线走向，这是一个文明形成、发展、盛衰与复兴的内在力量所在。实际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首先取决于每个文明内部的交往互动发展程度；同时，每个文明的整个内部结构，也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文明交往发展的程度。交往的开放性是内部的相融性和外部的开放性。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内外关系，犹如众多的经纬线交织在一起，通过复杂多变的交往实践活动，织成了人类文明绚丽多姿的文明史画卷，反映着人类生产、生活、生存、发展的不同方式。它促使研究者在普遍联系中确立用以把握世界历史的理论体系，回答全球文明化的整体性、联系性、依存性与制约性问题，从而获得文明交往的自觉。

三角形主题：人类文明交往互动，围绕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这三大主题的三角形活动路线进行。三角形的底线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互动，三角形的两边分别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交往互动。三者的交往互动，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同人间的“三间”联系中，以不同内容和形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类立足于自然整体存在的底线之上，实行人化自然和自然化人的社会化和理性化的实践活动。文明交往的命题是：对自然认知上有“知物之明”，对社会认知上有“知人之明”，对自我身心上有“自知之明”，对三角形交往实践上有互动的“交往自觉”。全球文明就是在这个交往互动、共处同进中逐渐实现。知而后明，明而后行，人类的文明交往自觉是在实践中求知，又以知导行。如《老子》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也如《易·系辞》中所说：“自知者，既能反复求身，则自知得失也。”“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这“三知”是良性交往的知性和理性所在：对自然不掠夺，因而有长续的资源；对别的文明不霸道，因而有和谐的共进；对自己不苟且，因而有独立的品位。果如此交往自觉，则文明之光可逐步普照于全球。

四边形层面：人类文明交往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这四个主要层面，其中制度文明又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根本层面——制度层面。制度文明交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生态文明也在文明交往中日益彰显其重要地位。物质文明归根到底决定着历史进程，不过它不

是唯一的，甚至往往不是直接的决定性因素。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各种因素，与物质文明的基层性因素一起，互为前提和条件，在交往互动作用中，形成了历史的总的合力。这种文明交往互动的历史行程，正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关于唯物史观的信件中所强调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力量的产物。”^①这里所说的“无数个力”，我理解就是人类文明的综合交往力。文明交往的重要之点，就是把这种“不自觉”的力量，化为自觉的力量。这种复杂多元的力，是彼此制约的，各人的意志虽不能尽遂人愿；但总是以融合的总平均数出现。人类历史虽然像自然一样运行，其实质都服从交往互动规律，只不过是人类有自觉的意识在起作用。人类不仅是适应，而且是认识、发现和掌握这种规律，并使之由历史哲学观念见诸实践活动。运用文明交往互动规律，创造新的文明成果，这正是文明自觉最关键之处。

五种社会文明交往形态：人类文明交往史上有五种社会交往形态，分别为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社会结构是文明社会内部和外部主体与客体的基本构成，它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宗族、民族、阶级、阶层等社会群体的交往。社会制度是文明的本质所在，它构成各种社会的内在体制形态。社会关系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之间的联系。社会意识属精神领域的思想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是文明的基本交往前提和首要历史活动。从根本上说，文明既是人文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它是由人类生产和交往实践所决定的社会历史形态。马克思在《马志民和拿破仑》中曾以社会生活形态为例，提醒历史学家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代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得到的。”^②社会生活表示着人类生存状态与命运走向，该领域从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工作”“需要”这些人类根本活动中，反映着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身心交往。对人文性、社会性考察越细致入微，也就可以从中全面认识文明交往的具体特征，从而取得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史学本体的进步和获得学术的自觉。

六条交往力网络：人类文明交往的驱动力是与生产力相互伴随的交往力，二者又是历史传统的积累和现实生活的创造力。生产力是人与自然交往而见之于物质的能力及其成果，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交往力，是广义上的交往力。为了突出物质的基础地位，说明生产和再生产在唯物史观的重要地位，把生产力从交往力提出来是十分必要的。这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生产关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指出生产关系决定其他一切关系一样。生产力是基本的交往力，它是决定社会交往力的基本力量。交往力是广泛的，交往力既见之于物质，也体现于精神；既见之于经济，也见之于政治、社会、思想和科技。这六条交往力是：精神觉醒力、思想启蒙力、信仰穿透力、经贸沟通力、政治权制力、科技推进力。这是六种人类特有的交往力。这六种交往力从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文明中产生，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交往互动作用过程中，形成了思想解放、文明自觉的文明开放多点、多线相互联结的信息网络。这六种交往力所互动的合力，比机械网络更复杂、更多变、更生动和更强更有创造力，因此，形成了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壮丽风采和恢宏气象。

七对交往概念：一切社会的变革和进步，都必然伴随着深刻的哲学思考。人类文明交往活动是矛盾的、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相互转化的。文明交往是一种历史哲学概念，按德勒兹在《什么是哲学？》中把哲学不同于科学和艺术在于“创造概念”的说法，文明交往因理性自觉而形成的基本概念有七对：传承与传播、善择与择善、了解与理解、对话与对抗、冲突与和解、包容与排斥、适度与极端。其中传承为文明内部发展之脉，而传播是文明外部交往之路，两者都是文明交往的生命活力所在；而善择与择善也属哲学范围，但对文明交往（无论是内部与外部）都有个抉择问题，不是直觉的抉择，就是洞察的和品味的抉择；了解与理解属不同的递进阶段，而尊重对方是其中的关键；对话与对抗、冲突与和解、包容与排斥之间，都有对立与转化联系；适度是文明交往自觉性的尺度，而极端为文明交往所应预防的危险倾向。

八项变化：人类文明交往是变动化的实践活动，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文而化、化而明的螺旋式上升的实践活动。人类是离不开交往的，人类又是需要文明的。试问：谁不需把文化上升为文明，谁不需要交往文明化？

这是自觉的程度问题。文明交往不仅需要哲学思考，更需要的是实践的哲学。《易·系辞》除了讲“穷”“变”“通”之外，也讲“穷神知化”，还讲“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后面讲，把结绳改变为书契，更和文字出现的文明标志联系在一起。人类文明交往通之于变、归之于化、成之于明。文而化之为文化，文而明之为文明。文明交往正是这种“变”“化”“明”的实践中的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言：“我只崇拜世界是变化的。”人在变动的事物中察明其‘化’的走向，这就是“人文”的能动力量。只有“化”才能“明”；只有明，才能使文明交往自觉深化，其中“化”因时、地、人而异。变化变通关键也在于“化”，而化要义有八：教化、涵化、内化、外化、同化、转化、异化、人化。教化是中华文明对人类交往的贡献，而“涵化”（也译为“濡化”“受化”，即 acculturation）则是对外来的文化思想接受、消化和吸收程序。我把此种西方理论改造为一种文化对外来文化刺激所作的反应，并在自己“涵化”基线上决定选择的类型。^①这种变化有各种发展形态和模式，是综合、融合的，认识升华，表明了事物普遍联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有这八项变化的进程，都因文明自觉的程度而决定其深化程度和路线走向。

九何而问：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在于问题意识的引导，它引导我们自觉地发现、提出、分析、解决人类文明的冲突、和谐、对抗、对话的主题。这些主题的追问，都是围绕着人类文明如何走向良性互动之问，它们可归纳为“九问”：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何果？何类？何向？何为？“九何而问”之中，“何故”是最关键一问，旨在解决“因为……所以”，即因果关系的“缘何如此”的问题。缘何如此？为何这样？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并提高到理论高度来解其“缘故”问题。“九何”之中，前四何是时间、空间、人间、事

^①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13 页；人民出版社 2013 年再版，第 9-10 页。“acculturation”与“enculturation”是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派用来描述人类心理形成的一对理论性极强的名词。这与民风民俗、教育养成等文化、教育有联系，也与文明之间的交往（跨文化接触与传播）有更密切关联。它与源自西方文化的“洗礼”大致意思相近，但“洗礼”带有较强烈的宗教感。因此，结构主义学派的人类学者用下面的代数公式来阐释人类的心理结构：自然社会=非人（植物与神）/人。我着重从文明交往的互动律特别从变化的链条上，来运用“涵化”表达文明之间的消化吸收作用。

件；后四何是结果、分类、方向、行为，总之是围绕“何故”而展开的问答过程。“九何”的“九”，意指数之极，言问题之多而求索不止，并非限于九而止步。回归史学本体，获得学术自觉，其途径是从问题始，以问题终，问疑不息，由一个思维周期，上升到更新周期。如明代学者陈献章所说：“疑者，觉悟之机也。”由疑、悟而自觉，由自觉到环绕问题意识、批判意识而发展，并重视问题的时代、历史、现实内容。“九何”旨在自觉认识自己理解和实践上的局限性，也意在把问题具体化、实在化，避免空洞抽象，而强调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宽广的研究空间，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面对这个新课题，引发我们思考全球交往文明化的新表象、全球化趋势与民族文化建构和交往文明化语境下的历史观等等人类文明自觉论问题。^①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自觉意识，是开放的学术思维方式。由人类的历史交往、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仅仅是从理论层面讨论的开始。我希望学界同行的更多参与，以提高学术的自觉性。

彭树智

2013年8月于西安悠得斋

^①张倩红：《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读〈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彭树智：《全球化与文明交往》，载《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1-792页。

目 录

一 总 论

论人类的文明交往·····	3
文明的真谛·····	33
战争、政治交往及其他·····	45
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路径·····	58
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	64

二 塞人编

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	73
塞人游牧文明与南亚中东农耕文明的交融·····	90

三 阿富汗编

丝路枢纽地区的文物考古和人类文明·····	97
近代以前阿富汗和中国的历史交往·····	123
论阿富汗的远古文明·····	139
阿富汗的古代城市文明·····	149
前伊斯兰时期阿富汗的文化形态·····	160
文明交往的丰厚馈赠·····	174